

儒林外史

儒林外史

【清·吴敬梓著】陈美林校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儒林外史

【清·吴敬梓 著】陈美林 校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儒林外史 / (清) 吴敬梓著: 陈美林校注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306-3466-6

I . 儒… II . ①吴… ②陈… III 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 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044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1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0.25 插页 2 字数 454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000 册 定价: 28.50 元

前 言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曾经说过:《儒林外史》出现后,我国“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”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一书的作者吴敬梓,出生于清康熙四十年(1701),卒于乾隆十九年(1754),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存年五十四岁。吴敬梓出生时,上距清军入关、清王朝迁都北京(顺治元年,即1644年)已近六十年,明末清初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已逐步趋向缓和,清王朝的政权也已相当稳固。吴敬梓的生活时代,正当历史上著名的康、雍、乾“盛世”,同时,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,生产规模不断扩大,手工业、商业日益繁荣兴盛,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;即使在文化、学术上,也由于清政府出于消弭敌对情绪、巩固政权的需要而采取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、接受并崇尚儒家思想的政策,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,如纂修《明史》,编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,社会生活较为安定。

然而,生产和经济的发展,又造成了财富相对集中、两极分化扩大,日益沉重的田租赋役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,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,贫富对立,潜存着深刻的社会危机。在文化学术方面,清政府在大規模纂修图书的过程中,又大量销毁、删削对自己实行封建统治不利的著述。据孙殿起为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所作的序中统计,乾隆朝被销毁

的书籍“将近三千余种，六七万卷以上，种数几与《四库》现收书相埒”。因此，大规模纂修图书，固然有集中资料、保存典籍、繁荣学术文化的一面，但也有篡改历史、歪曲真相的一面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又无异是一次文化浩劫。从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看，怀柔与镇压相结合，一方面恢复科举制、尊孔读经，以笼络广大士人；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、科场案，以迫害异己的知识分子。文字之狱，“盛世”三朝，无朝无之。约略统计，康熙朝有十餘起，雍正在位仅十三年，却增至二十餘起，乾隆朝又多至八十餘起。至于科场案，虽然是惩罚考试期间作弊、行贿的官员、士子，但实际上有着震慑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用心。

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，才为吴敬梓创作以公心讽世的杰作《儒林外史》提供了丰富的题材。没有这样的土壤，任何天才也不能凭空杜撰。

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，虽出生于安徽全椒县，但其先世并非安徽人。据现存资料可知，其先人是从浙江温州迁徙到江苏六合县，再迁居到安徽全椒的。吴敬梓的曾高祖吴沛，字宗一，号海若，晚年又号樗园。生于明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卒于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存年五十五岁。吴沛屡困场屋，“七战皆北”，从而失去中举机会，直到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，已过不惑之年，方补为廪生，前往历阳（今安徽和县）教书，为“东南学者宗师，称海若先生”（陈廷敬《吴国对墓志铭》）。吴敬梓曾祖吴国对，字玉随，号默岩。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卒于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，存年六十五岁。与其弟吴国龙为“孪生”。吴国对为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一甲第

三名进士,即探花,为兄弟五人中功名最高者。但因不通满语,终生未得大用,吴国对为此曾喟然长叹:“此乃天之所以限我才也!”曾出任福建乡试主考,后迁国子司业,提督顺天学政。从事教职多年,子弟颇多,“一时名公巨卿,多出其门,李文贞公(光地)其一也”。其八股文写得极好,“所为制艺,衣被海内”(方嶠《文木山房集序》)。与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、施闰章、冒辟疆等人均有唱和。著作有《赐书楼集》二十四卷。

吴敬梓的祖父吴勛、生父吴雯延、嗣父吴霖起三人均科场不顺,都只是秀才。而叔祖吴晟、吴曷和族兄吴縻均为进士,其中吴曷还中了一甲第二名,亦即榜眼,是整个吴氏家族中功名最高者。由于各房之间功名高低大有差异,子女人数或多或少,甚至没有子女,从而出现出嗣、立嗣的问题;再加上大多有妻有妾,子女便有嫡出、庶出之分,因此极易彼此嫉妒、相互欺凌;更兼财产分配问题,故家族内部矛盾非常尖锐。这种矛盾在吴敬梓的祖辈便已开始,到其父辈时有所发展,到吴敬梓这一辈时终于爆发,为了争夺遗产,族人连祖风世德亦置之不顾。吴敬梓在《移家赋》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:“君子之泽,斩于五世,兄弟参商,宗族垢谗”;“淳于恭之自簠不见,陈太邱之家法难寻”;“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”!从而使吴敬梓透过宗法社会中的家族矛盾,进而认识到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道德的虚伪,体验到人生道路的曲折和世态人情的炎凉。这样的家世,不仅对作者形成、创构《儒林外史》的主旨立意,而且对刻画人物、提炼情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比如,小说中的理想人物虞育德的描写中,就含有着作者族曾祖吴

国缙的若干事迹。

吴敬梓字敏轩，又字粒民，晚号文木老人，别署秦淮寓客。生于清康熙四十年(1701)，卒于乾隆十九年(1754)。在他出生之际，吴氏家族已日趋衰败，家族成员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，他的生活也日逐堕入贫困之中。他的一生中，经历了幼年丧母与出嗣、青年丧父与夺产、中年移家与却聘、壮年修祠与出游，直到最后病死扬州而归葬南京。吴敬梓生父为吴雯延，自幼出嗣给伯父吴霖起为子，从而成为吴国对这一支的宗子(长房长孙)。按照封建宗法制，宗子在家族中有着很高的地位，祭祀祖先时享有主祭权，在分配家产时亦可多分到一些。因此，这一“宗子”的身份本身就使他成为家庭其他成员妒嫉的对象。

吴敬梓十三岁时丧母，翌年，即随被任为江苏赣榆县学教谕的嗣父吴霖起赴任江苏。在此期间，他在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、学作八股文的同时，阅读了大量的诗词、小说、戏曲作品，为其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大约十六七岁时，吴敬梓回乡与陶钦李之女成婚，并曾就近向一位号叫切庵的名塾师学习，从此，八股文的写作大有长进。在全椒度过一段岁月后，便偕新妇陶氏前往赣榆。十八岁时，吴敬梓曾到南京，为其寄寓在丛霄道院的生父吴雯延“侍疾”，在父亲的严命下，匆匆赴滁州应试，不待完卷，即赶回南京，护送生父返乡。回全椒不久，生父即去世，就在此时，传来吴敬梓入学的消息。吴敬梓在家守制，不久复回赣榆。康熙六十一年(1722)，吴霖起罢职，携吴敬梓夫妇回到全椒，一病不起，次年便去世。此时吴敬梓方二十三岁。由于生父、嗣父的相继

病逝，吴敬梓的“宗子”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，族人覬覦家族遗产者更加肆无忌惮，由暗夺进而明争。吴敬梓生性高傲，又长期离乡，既不屑与族人周旋，又不善于理财，一旦爆发遗产之争，竟无一人主持公道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父祖的遗产被人夺走。但在这一过程中，他却看清了隐藏在仁义道德面具下族人的嘴脸，进而对封建道德的伪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几年后，妻子陶氏又因难以经受娘家彻底败落的精神打击而谢世，又给吴敬梓带来了深深的痛苦。二十九岁时，作者再次赴滁州参加科考，虽因与友人小聚时，酒后有“出格”言语而遭申斥，幸而学使大度包容，被破格录取；然而此年秋试中仍未脱厄运，再度铩羽而归。家产被夺、爱妻病故、科场失利，连续给予他沉重的打击，以至于发出“不婚不宦，嗜欲人生应减半”的怨恨，故乡不可再留，于是产生了“秦淮十里，欲买数椽常寄此”的念头。

雍正十一年(1733)二月，吴敬梓偕续弦叶氏和年方总角的长子吴烺举家迁至南京，在淮青桥附近购置了秦淮水亭，居住下来。乾隆元年(1736)，吴敬梓被举荐赴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，中途因病辍考，其后，功名之心逐渐淡薄。因受颜(元)、李(塨)学派重视礼乐农工思想的影响，他和友人程廷祚、樊明征等人倡议并参加修复南京先贤祠，甚至不惜“售所居屋以成之”(《儒林外史跋》)，然而他的生活也更加窘迫。一次，其亲友程丽山命子携米三斗、钱二千去探望他时，他已“不食二日矣”。冬日苦寒，无御寒之具，他便邀好友“乘月出城南门，绕城堞行数十里，……逮明，入水西门，各大笑散去。夜夜如是，谓之‘暖足’”。由于穷困潦倒，吴敬梓从四十一岁

开始经常外出,投靠亲友,以求接济。如曾任江宁知府、两淮盐运使兼督理扬州关务的卢见曾和先人为淮安盐商、极其富有的程晋芳等人,都曾邀他前往。多次出游扬州、淮安、真州(今江苏仪征县),使他既结识了许多文人,也目睹了盐商的豪奢;既浏览了公私藏书,又体验了淮、扬风俗。从封建大族降为小康之家,再堕入贫困,这对于作为文学家的吴敬梓来说,也许并非坏事。这种生活经历,使他能够接触到市井小民,了解到社会上层与下层的生活状况,从而促进了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增长,这对于《儒林外史》的创作,也具有着重要意义。

乾隆十九年(1754)十月下旬的一天,五十四岁的吴敬梓忽然将囊中剩餘的钱全部拿出,买了酒点茶食,邀请朋友欢宴。席中大家尽情畅谈,微有醉意的吴敬梓却不断吟诵张祐的《纵游淮南》一诗:

十里长街市井连,月明桥上看神仙。

人生只合扬州死,禅智山光好墓田。

在座的人都十分诧异。几天后,十月二十八日晚,当他送走来访的诗人王又曾后,自己解衣上床。睡了不到片刻,忽然痰涌不绝,家人还来不及给他吃药,就已病逝。此时只有幼子守在床边。戚友金兆燕闻知噩耗,赶来为其安排后事。当检点遗物时,除典当衣服的钱还剩少许外,已经一无所有。友人王又曾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求助,才有了营葬之资。由金兆燕将其棺木从扬州水路运回南京,安葬在清凉山麓(一说在凤台

门)。

除《儒林外史》之外,据平步青《霞外捃屑》卷九所记,吴敬梓曾撰有“《史汉纪疑》,未成书”,可见他对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曾下过功夫,并意图有所著述。他又曾研究过《诗经》,程晋芳在《文本先生传》中说他著有“《诗说》若干卷”,惜未传世。此外,吴敬梓曾先后为友人江昱的《尚书私学》、李本宣的《玉剑缘传奇》、徐紫芝的《玉巢诗草》和汤懋坤的《石臞诗集》作过序。

吴敬梓还写有不少诗、词、赋,四十岁前的作品大多收于现存的四卷本《文本山房集》中。据《安徽通志稿·艺文考》云:“《文本山房集》凡四卷。卷一赋四首,卷二、卷三诗百三十一首,附芜湖朱卉、江都李本宣同作七绝各一首;卷四词四十七首,乃敬梓四十前作。”金和在《儒林外史跋》中说:“《文本山房文集》五卷,《诗集》七卷。”但这十二卷本的《文本山房集》却至今未曾发现。不过,根据资料推断,吴敬梓定当另有不少诗文,可惜今日不能尽知。1949年以来,陆续发现了吴敬梓不少诗文,1958年出版了《吴敬梓集外诗》,辑了一些佚诗。此后仍有不断发现,至目前所知,总计在三十余篇(首)左右。但是,吴敬梓的传世之作却不是传统的诗词歌赋,而是为正统文人所鄙视的小说《儒林外史》。

吴敬梓移家南京后不久即开始创作《儒林外史》,经过长达十四五年之久的写作、修改和补充,大约在乾隆十三年(1748)到乾隆十五年(1750)之间大体完成。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表现方面,都有显著的特色;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,都占有光辉的一页。

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，吴敬梓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，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、境遇的顺逆、功名的得失、仕途的升降、情操的高尚与低劣、理想的倡导与破灭、出路的探索与追寻。特别是从“楔子”的元末明初写起，直至“幽榜”一回的万历四十四年，前后历时二百四十八年，反映了几乎整整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。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。从其具体描写看，虽然假托明朝，但却反映了清朝康乾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。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的政策之下，或是受其羁縻，或是拒其牢笼；或惨遭镇压，或远祸全身。吴敬梓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表彰，既有肯定也有否定。从他们的生活情景入手，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，探索了培育人材、有助政教的途径，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，而将目光注视于“市井中间”崛起的新人，从而表现了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。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。

作者在《儒林外史》开宗明义第一回中，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、不满以时文八股取士的王冕这一形象，使之成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。从第二回开始直至第五十五回，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士子，其中大多数人醉心于八股举业，藉以谋求功名、猎取富贵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有的白首穷经，却未博一第，生活困苦，甚至卖儿卖女，如倪霜峰；有的寄人篱下，为人做幕，周游四方，以至客死他乡，如牛布衣；有的故做放达，以名士自居，攀附豪门，以谋衣食，如西湖名士、娄府清客等；有的谋一馆地，借以糊口，甚至成为盐商西席，如余特；或去边陲教书，如沈大年。而一旦取得功名，随即成为统治阶级

的帮凶帮闲,如南昌太守王惠,一心想着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;周进、范进中进士后成为学道,又为推行曾使自己受尽苦楚的八股科举制度效力。不但已经获取功名的士人认为惟有举业才是“光明”出路,才是有无学问的惟一标准,如施御史说:“有操守的,到底要从科甲出身”;鲁编修亦说:“如果有学问,为什么不中了?”即连功名未遂的士子,亦热中于举业,执著于科场,马纯上就说:“人生世上,除了这事,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”,“只是有本事进了学,中了举人、进士,即刻荣宗耀祖。”因之,全国士人于时文举业无不趋之若鹜,如醉似狂,全身心都受到腐蚀毒害。而为了取得功名,又不惜通关节、营贿赂,上下勾结,公开买卖。大批士人,除了宋儒注疏的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以外,全然不知尚有其它学问,甚至连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也未见得读通。总之,这一制度造就了大批既无操守又无学问的士子,少数变成统治阶级成员,绝大多数则沦落终身,即使已经相当腐败的吏治更趋腐败,又使业已极端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。
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,知识分子有没有另一条生活之路呢?作者在《儒林外史》中做了极为冷静的思考,不断进行新的探索。这体现在作品中的肯定人物身上。小说中知识分子正面形象大体有三类:一类是“楔子”中即行出现的王冕,一类是小说中部方始上场的以虞育德为首的几个主要人物,一类是书末方始登台的“四客”。这三类人物在小说中走马灯式的转换,正表明吴敬梓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执著追寻,反映了作者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思想的日趋先进。

王冕出现的这一回目是“借名流隐括全文”,作者显然是

将他作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来刻画的，力图使其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。他的思想行为是符合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的儒家思想规范的。不过，他之所以“不愁衣食”地避居山中，则是依靠卖画所得来维持的。这也初步显示出士人偏离读书—做官这一生活轨道的倾向。至于以虞育德为首的第二类士人，他们不像王冕那样只是一介平民，而是有着大小不等的功名，是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物。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的虞育德，却对自己负有管理、教育责任的生员表示“我也不耐烦做时文”，并且声称“我要做这官怎的”？他毕竟为生计所迫，虽然不能跳出以俸禄维持生计的生活模式，但他已在为后代设计如何脱离读书——做官的传统道路。他对杜少卿就说：“现今小儿读书之余，我教他学个医，可以糊口。”这实在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生活道路不断探索的重要表现。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彻底脱离这种生活模式呢？这在整部小说情节即将结束的第五十五回中出现的“四客”形象身上，体现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新的认识。写字的季遐年、卖纸火筒子的王太、开茶馆的盖宽、做裁缝的荆元，这“四客”都是市井中人，然而作者却赋予他们以读书人的性格。他们以自己喜爱和擅长的技艺——琴、棋、书、画去自娱娱人，并不以它去追求功名富贵，因此，他们自尊自重。而之所以能如此，又在于他们不依赖俸禄维生，而是自食其力。经济上独立，方可以摆脱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附，从而保持人格的独立。“四客”与小说前文中出现的读书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。这也正是吴敬梓不断追寻的“新人”理想的具体体现。

当然,“四客”中除了盖宽最后被人请去教书以外,其他三“客”的下场如何,书中并无交代。这种不结而结的艺术处理,正表明吴敬梓虽然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模式应予以肯定,但对于这样的生活模式是否能代表生活发展的主流趋势,依然心存犹疑。不过,生活在近三百年前的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作家,已然在读书—做官的定势之外寻找知识分子新的生活之路的努力,却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。而这种追寻,也正使得《儒林外史》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巨大的社会价值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不仅以其崭新的思想,而且还以其独创的艺术屹立于我国古代小说之林,显示出摇曳多姿的风貌。首先是它的讽刺艺术,其成就比之于世界讽刺文学大师莫里哀、果戈理亦不逊色。鲁迅赞之为“诚微词之妙选,亦狙击之辣手”,认为在它之前,说部之中没有“足称讽刺之书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);而在其以后,如此“旨微而语婉”的小说“就可以谓之绝响”(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)了。吴敬梓继承了《诗经》开创的“美刺”传统,其意在于“醒世”,非为“骂世”,而其作品的客观意义却自不同。鲁迅说过:“……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,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,更非笔墨所能救了。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,而且还适得其反,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,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,倒反成为有益。我想:从别一群看来,感受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,他们会觉得‘暴露’更多于‘讽刺’。”(《什么是“讽刺”?》)的确,不但小说中的否定人物有种种“恶德”,即连一些正面人物,也有许多“缺点”。他们确是一群“不可收拾”的没落者,作者最后亦不再对他们抱有幻想,而将期望寄予“市

井奇人”。这样的描写已非传统的“讽刺”概念所能范围。至于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手法,更是丰富多彩,极富变化,夸张、白描、冷嘲、热讽,或写出前后态度之变化,或点染周围之有关事物,或以其自身之言行,或以他人之品评,或彼此攻讦,或相互吹捧,或以回目配正文,或以补叙交待前情等等,不一而足。各种手法纷至沓来,令人目不暇接,叹为观止。

其次是它的结构艺术,极富独创性。它的结构艺术,“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”(天僊生《中国历代小说史论》),然而却有所发展、创新。对这种独特的结构艺术,在“五四”前后,曾有一些非议,主要认为它是短篇杂凑,没有布局(见《缺名笔记》及胡适的有关论述);即使连对《儒林外史》给予充分赞扬的鲁迅,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此种见解的影响,认为它“是断片的叙述,没有线索”(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)。其实,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为安排情节、刻画人物从而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服务的,只要圆满地完成此一任务,就是成功的结构。《儒林外史》实际上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生活史。吴敬梓通过对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绘,揭露和抨击了封建末世的黑暗和弊端,并提出改良主张;同时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、不断发展的过程。它的艺术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。从纵向看,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如下几条线索: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、毒害;个别人物受到迫害、镇压;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,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过程中逐步幻灭。围绕对知识分子的描写,深入解剖了官场与社会,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聩无能,使得吏治越发腐败与黑暗;受礼教毒害的人士

口是心非,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,道德观念日趋薄弱。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,切盼他们有所改善;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,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。然而他们都先后使作者失望,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另行寻求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、时起时伏地贯穿小说全部,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。从横向看,整部小说结构除“楔子”与“幽榜”外,可分成三大部分,作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,分别主次,精心地安排在三大部分中。第一部分,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,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、为理学所毒害的士人。第二部分,从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六回,前一部分出现的人物虽依然存在,但重点则在于描绘正面人物的理想及其破灭的过程。第三部分,从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五回,第二部分出现的正面人物虽已成为过去,但他们的影响还在;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,而且更其不堪。因此,在第五十五回,作者不得不“述往思来”,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,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。至于“楔子”与“幽榜”,则先后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,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浑然一体。总之,其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两个主角为中心,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,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,了解生活;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及其发展为轨迹,直接引导读者在《儒林外史》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。这样的结构艺术是具有创新意义的,虽然细枝末节处不无纰漏,但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名著也难以尽免的,不宜苛求。

《儒林外史》成书以后,当时虽尚未有刻本,但已“人争传写之”。直到金兆燕任扬州府学教授时,方“梓以行世”。但

前 言

这一刻本至今未见。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(1803)卧闲草堂本。此后有嘉庆二十一年(1816)艺古堂本、清江浦注礼阁本、同治八年(1869)群玉斋活字本、同治十三年(1874)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、齐省堂增订本、光绪七年(1881)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、光绪十四年(1888)增补齐省堂本(此为六十回本,其中四回系他人窜入)。此外,还有嘉(庆)、道(光)、咸(丰)之际苏州潘世恩抄本,此为目前可以见及的惟一的清代抄本。民国以后、建国以前,也有多种刊本行世,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本和亚东图书馆本。建国以后各种整理本及蒙古、英、德、俄、越、日、匈牙利、捷克、西班牙等语种译本陆续出版。此次校注即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,以苏州潘氏抄本、艺古堂刻本、群玉斋活字本参校,重新加以校勘整理,并附以简要注释,以飨读者。限于水平,欠妥之处亦在所难免,盼海内外读者有以匡正,以期后改。

陈美林

1992年12月于南京